

向人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

——繁荣新时代农村题材
文学创作笔谈(之七)

新时代山乡巨变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面镜子

□李迅雷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面镜子,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但我们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不能仅就新时代写新时代,而要有历史感与未来感,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将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加以把握;也不能仅就乡村写乡村,当代乡村涉及到的问题是与城市、中国、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切身的体验,才能真正认识到当代乡村正在发生什么

现代以来,中国的乡村发生了数次巨大变化,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经典作品,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是最根本的巨变,但尚未得到充分的书写。“土地改革”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也结束了因土地分化而带来的历代王朝兴衰、治乱的循环,开启了新中国史的新一页,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这一伟大变革。“合作化”是新中国成立后为避免土地分化而采取的集体化措施,也为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柳青《创业史》、周立波《山乡巨变》、赵树理《三里湾》等经典作品为我们描述了这一社会进程。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在合作化所奠定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调整了生产的组织形式,这就是“包田到户”,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这一政策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乡村经济得到了极大的繁荣发展,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高晓声《陈奂生上城》、路遥《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何士光《乡场上》等作品为我们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与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这些乡村巨变每一次带来的都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调整,以及乡村面貌天翻地覆般的巨大变化,对比鲁迅小说中旧文化统治下的乡村世界,以及茅盾小说中濒于破产边缘的乡村经济,土改以来的乡村叙事展现了中国乡村新的活力与新的前景。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这些变化的积累与延续,也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乡村的面貌,中国乡村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中国乡村正在走向城镇化与现代化,中国也正在从“乡土中国”转向“城镇中国”,现代性的法制、教育、医疗、交通、物流与基础设施等进入乡村,彰显了时代的巨大进步,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与农耕文明也受到巨大冲击,乡村中“家族中的人”正在转变为现代社会中原子化的“个人”,传统的时间观念、空间观念、家庭观念、生育观念等,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也正发生着巨变。农村土地作为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现代经济中已大幅贬值,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比重也在降低。新时代的新观念与新技术,也在同步塑造和影响着新时代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农业机械的普遍应用大幅降低了传统农业的劳动强度,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等新概念重构了乡村的食品观念,微信、抖音、拼多多等APP的使用正在重塑新的生活方式与新的人际关系模式,“空气可以合成粮食”“细胞可以培养肉”等可能的技术进步也在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

当前中国乡村中不仅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也有逐步发起来的工业文明,还有飞速发展的信息文明,在西方数百年历史上逐渐演变的农业、工业、信息等不同历史阶段的文明体系,在当前的中国乡村中彼此共存共生,互相碰撞激荡,混杂糅合在一起。现在的乡村中既有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也有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的矛盾与和解,包蕴着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可能性。

在文学的“港”湾,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上接第1版)

为播撒文学的种子,讲述香港文学的历史变迁,同时为香港文学馆开馆预热,5月11日至20日,由香港文学馆联合香港作家联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共同主办的“南来作家手迹遗物展——走进文学时光的卷轴”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行。展览展出了萧红、端木蕻良、戴望舒、许地山、梁羽生、金庸、徐訏、吴羊璧等24位知名作家的手迹和物品逾330件,其中200多件为原件,包括国家级文物和首次亮相的作家手稿。

在“南来作家手迹遗物展——走进文学时光的卷轴”开幕式上,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参与筹办此次展览的情况,并表示,展览中的每一份手稿、每一件物品,都见证了文学的一束历史和历史的繁花。香港文学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束绚丽璀璨的文学。在作家的笔记和印记中,回望过往年代作家南下香港,为香港文学增添了色彩与养分,成为香港文学的重要力量。中国现代文学馆愿意全力支持香港文学馆的建设发展,积极开展合作,共同为香港和内地文学融合发展作出贡献。

“南来作家”指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从中国内地南下定居香港的作家群体。据介绍,“南来作家手迹遗物展——走进文学时光的卷轴”是香港历年最具规模的南来作家展,展示了作家们在香港的创作轨迹,凸显其著作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及对香港文学产生的深

远影响。参加展览开幕仪式的内地和香港文化界人士表示,通过这次展览不仅能欣赏到作家们的手迹遗物,更能透过这些文字手稿感受作家们的创作灵感与心路历程。“南来作家”构成的独特文化现象,本身就是香港与祖国之间文化传承源远流长的最好例证。希望此次展览成为内地与香港文学交流学习的契机,共同促进香港文学的繁荣发展。

5月27日下午,作为香港文学馆开馆系列活动之一,作家刘震云在香港都会大学举行以“文学的底色是哲学”为题的文化讲座。刘震云从古典名著《红楼梦》《西游记》等谈起,阐释文学作品中的哲学蕴涵,并表示生活的底色是哲学,但文学绝不是生活的机械反映。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有自身的哲学意蕴,而与哲学的艰深又不同,最好的文学是用质朴的语言说出最深刻的道理。

据悉,开馆展“万物有文 文里寻花”于香港文学馆开馆当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展览以植物为主题,通过呈现张爱玲、叶灵凤、西西、也斯等作家曾书写过的花草树木,将文学与本土自然景观结合,呈现香港别样的情致。香港文学馆常设多个主题展,讲述南来作家在香港创作的历史、通俗小说的繁荣、武侠小说的鼎盛、儿童文学的蓬勃发展等主题,重点展品包括张爱玲《小团圆》手稿复刻版、萧红写给萧军的书信真迹等。馆内设有新媒体装置,有助于参观者沉浸式感受香港文学的魅力,涵养人文精神,激发青少年对文学和文化的兴趣。

山乡巨变为文学创作提供广阔天地

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少村庄的存在形态正在消失,而转变成为了城市中的街道或社区,在现代化的视野中,传统乡村中的人际关系、伦理秩序与生活观念也在经历巨大的裂变,这都是此前的巨变中所没有或极少见到的。可以说这一巨变较之土改、合作化、包田到户等更具根本性,也更具历史性,可谓千年以来中国乡村最大的变化,其中蕴含的深层意蕴与意义可能尚需时日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城乡关系的变化。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谈到,在中国,“乡村”与“城市”的区别不仅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也在于来自不同的文明视野,或者说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等现代核心命题在中国社会内部构造出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乡村”与“传统”、“中国”联系在一起,而“城市”则与“现代”、“世界”联系在一起,城乡之间的差异(包括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中国”与“世界”的差异。而伴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弭,那时的乡村必将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但传统的中国文化将在何处立足,或者我们能否发展出一种适应乡村生活、现代生活的中国文化?这将是我们的巨大挑战。

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面镜子,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天地。但我们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不能仅就新时代写新时代,而要有历史感与未来感,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将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阶段加以把握;也不能仅就乡村写乡村,当代乡村涉及到的问题是与城市、中国、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切身的体验,才能真正认识到当代乡村正在发生什么。以脱贫攻坚为例,我们说“中国乡村正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看似简单,但这却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普通人也能吃饱穿暖的时代,即使史书上称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下层老百姓的生活也极为艰难;但对于文学来说,我们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

何书写富裕或正在富裕起来的农民,如何描绘他们的生活变化与内心世界。在鲁迅、茅盾等人开创的文学传统中,我们有描写穷苦、穷困农民的丰富经验,但在文学史上我们是第一次面对摆脱绝对贫困的农民,这是对当代作家的巨大挑战。

再如土地与人的关系,在描写土改、合作化、包产到户的经典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与土地的深厚感情,“我们终于分到了土地”,一句话蕴含着千百年的梦想和一个时代的最强音,曾经打动了多少人的心。但在我们的时代,土地与人的关系却变得逐渐疏远了,不少人摆脱土地进城打工,或者在乡村从事其他行业。这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来说是进步,但从土地与人关系的角度,我们正在经历的却是极具历史性的时刻,也是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戏剧性转折,我们该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乡村的城镇化与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必然,但从中国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则值得再思考,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据地,当更多的人成为“城里人”之后,我们如何在新语境中传承与发展传统?

以文学参与构建崭新的时代文化

这些都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面对与思考的新现象、新问题。只有从各个角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经验,我们才能书写出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这也是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性与价值所在。传统中国文化建基于传统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之上,经过近两个世纪的艰难探索,在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社会结构由“家-国”转变为“人民-国家”,生活方式越来越现代化,必然要求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发展出新的中国文化。这种新的中国文化必然与传统中国文化不同,但又在传统中国文化根基上生长出来的,也必然与现代西方文化不同,而有着中国人独有的底蕴、胸襟与情怀。

只有构建出这种新的中国文化,现代中国人才能摆脱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挣扎彷徨,才能真正实现安身立命。目前这种新的中国文化尚处于理论构建阶段,这就为新时代文学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空间。与理论建构需要缜密的思考、理性的分析不同,文学创作与活泼泼流动的生活、鲜活的经验与个人的直觉贴得更近,文学可以深入纷繁复杂的生活及其不同侧面,不断发现新的经验、新的矛盾与新的现象,并以独特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经验的基础和美学的向度。

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也在于以文学的敏感与先锋性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发现新时代山乡巨变蕴含的深刻意蕴,并在构建新的中国文化中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鲁迅等新文学的开创者在他们那个时代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在今天应该继承他们的传统与精神,在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书写中凝聚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凝聚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凝聚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

《民族文学》(创刊中心)作家培训基地

本报讯 近日,由《民族文学》杂志社、重庆市作协、酉阳县委宣传部主办的2024《民族文学》创作基地(创刊中心)作家培训班暨酉阳创作中心授牌活动在重庆酉阳举行。《民族文学》主编陈亚军、重庆市作协主席冉冉、酉阳县委书记祁美文致辞。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作家学员参加培训。

陈亚军表示,在少数民族地区创建《民族文学》创作基地(创刊中心),旨在引导各民族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各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中激发创作灵感,同时培养更多作者和读者,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积蓄后备力量。创作基地已成为向基层延伸文学手臂的重要途径,播撒了文学的种子,搭建了文学交流的平台。

冉冉谈到,少数民族文学是重庆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重要阵地。希望作家们深化交流互动,创作更多优秀作品,共同促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授牌仪式上,陈亚军代表《民族文学》向酉阳授牌,《民族文学》重庆酉阳创作中心正式挂牌。培训期间,陈亚军、冉冉和诗人娜夜、作家潘红日分别以“文学创作与时代内涵”“看见与说出——诗性的勘探”“诗歌面对人工智能”“驻村笔记”创作谈为题,与学员进行交流;举办改稿会,《民族文学》编辑对18位基层写作者的作品进行点评;举行创作基地(创刊中心)工作交流会。大家表示,一系列活动极大调动了基层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为培养文学新人、推动地方文学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现代以来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深厚传统、精神启示及其转化发展”,我首先想到的是乡土中国的变化,以及与之相伴的来自中国文学审美传统的变革。

我想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在《故乡》里,鲁迅用一种新鲜的语法和叙事引领读者去认识中国乡村里的人,鲁迅塑造了这一个“闰土”,写下了闰土被岁月、被贫困、被苛捐杂税压榨得几乎到麻木的精神际遇。事实上,《故乡》是现代乡土文学的重要起点,鲁迅是以启蒙主义视角构建了乡土文学书写传统的重要作家。当然,现代乡土文学传统也有另外的面相。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构建了平静而富有诗意的乡村之景。从这两个创作方向可以看到,现代文学对乡村的想象是矛盾而纠缠的:一方面,乡村是启蒙和拯救的对象;另一方面,乡村则是我们生发“乡愁”之地。这两种乡土美学共同构成了中国乡土文学书写的传统。

直至解放区作家的出现。作为解放区走出来的作家,从《荷花淀》《山地回忆》到《铁木前传》,孙犁深情赞美中国农村的人情美、人性美,成功塑造了一种明媚、明亮、有着昂扬之气的乡土生活。事实上,中国农村生活和农民面貌在包括孙犁在内的解放区作家笔下焕然一新,这是重要的文学审美变革。比如《铁木前传》,孙犁书写的是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在作品中,孙犁写下了中国农村社会风俗习惯的巨大改变、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写新环境和新景物,也写出新的情感和新的烦恼;写出了所处时代“复杂的生活变化的过程”。孙犁笔下那些新的农民,尽管他们可能性格上有缺陷,有令人不满意之处,但他真诚地给予他们同情、爱与理解,那不是启蒙主义视角的写作,而是出自农民和农村立场的写作。即使历史条件已经变迁,那热火朝天的景象、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谊、青年人之间的情愫暗生依然有着穿越时光的魅力。孙犁小说是与时代紧密结合的,但是,也有超越时代的魅力,多年后,我们从他的作品中也能辨认出属于我们的痛苦和热爱、悲伤与喜悦。

之所以能刷新中国现代文学乡土书写传统,当然与作家的个人创造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翻天覆地的现实。在解放区,农民当家做主人,是这些作品美学发生根本变革的重要动力。早在1940年代,孙犁还是文学青年的时候,他便辨认出了冀中解放区的变化:“跑在街上,推动工作,登台讲话,开会主席的人,多半换了一些穿短袄、粗手大脚,‘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年轻人。出现了一些女人,小孩子……这些新人,是村庄的新台柱。”因为感受到时代激变的脉搏,孙犁写出了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在孙犁看来,处于变革之中的写作者,一定要比别人更关心时代、社会、人,要有总体视野和对总的时代精神的把握,要对时代有更人的理解力。当年孙犁写下的这些看法如此精辟而有穿透力,至今读来都深具启发性。

什么是解放区文学的写作传统?我想,写作者要看到时代的巨变,看到新的农村现实和新的农民生活并诚实表现,同时也要寻找表现巨变的新角度、新方法。在评价赵树理《李有才板话》时,郭沫若说,他为“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陶醉了。“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事实上,在读到《荷花淀》时,方纪也提到了小说别开生面的中国式表达,也就是说,孙犁作品使人喜闻乐见的原因在于作品的文学品质,在于语言的干净、清新与优美。

真正的艺术家要有思想,要善于将他(她)的思想和他(她)的理解力转化为艺术语言。《铁木前传》里固然有孙犁对于新的中国农村的深入观察,但最令人赞叹之处在于他将自己对乡村中国的理解用一种艺术手法进行了转化,由此,这部作品才显现了美丽而深刻的特点。虽然当时的农村生活离我们已远去,但那里所表现的人们精神追求却永远让人向往。事实上,无论是《小二黑结婚》《铁木前传》还是《创业史》(山乡巨变),作家们的贡献在于既写出时代巨变,也将他们要表达的思想、他们所追求的现实主义风格与一种别具艺术气质的汉语表达融合在了一起,这些作品是好看的、常读常新的。

今天,讨论农村题材作品时,强调写什么固然重要,但也要深入思考如何写、怎样写。一部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既代表我们时代作家对农村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也代表我们时代作家的文学追求,代表我们时代的文学审美、我们时代的阅读趣味。换言之,一部作品的优秀,不仅在于深刻的内容,同时也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语言与形式,它应该是人人爱读的艺术品。

今天,我们看到“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正在切实推动着中国文学创作特别是农村题材创作的发展,涌现了优秀的作家作品。可是,越是看到农村题材作品大量涌现,恐怕也就更要深入思考,如何面对我们优秀的乡土文学传统,以及如何将这些传统实现新的转化、新的拓展。我认为,这是在思考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方向时所需要正视的:要写出我们时代新农村的重大变革,要写出我们时代农民人的精神追求、心灵生活,同时,更要寻找与这种新生活、新变化相匹配的新形式、新表达。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青春的方向》唱响 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河北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长篇报告文学《青春的方向》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河北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伟,保定学院党委书记胡连利,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孙雷,以及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活动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梁鸿鹰主持。

《青春的方向》由李春雷创作,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为蓝本,刻画了这群青年学子朴实勇敢的动人模样,生动呈现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给该群体回信以来,越来越多青年选择到西部去的新奋斗、新成就。

与会专家认为,《青春的方向》充满文学魅力,是一部底蕴深厚、彰显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作者用饱含深情、细腻动人的文字,以书中群像为代表,映照了当代青年人的精神信仰;以现实为观照,展现了历史与当下的遥遥呼应;以青春为主题,写出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当代青年的人生选择,提炼出当代青年所需要的“精神之钙”;该书双线叙事、点面结合,既有生动感人的故事,又有深厚宽广的历史,唱响了一曲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李春雷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作为一名有师范生经历的作家,李春雷对书中人物带有天然的亲切感。2024年春节前夕,李春雷前往新疆且末现场采访,倾听亲历者们讲述他们跨越山海、远行万里的故事,收获了大量鲜活生动、感人至深的第一手资料。

(罗建森)

寻找书写变革时代的新方法

□张莉